

尺书飞云贺新年



慢时光

戴骏华

春节有许多传统习俗，拜年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倘若亲友居住在外地，无法登门拜年，邮寄贺卡便成了一项不错的选择。

早在宋朝，文人雅士间就有送帖致贺之风。明人文徵明在《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时过境迁，古时的飞帖早已演变成现在的贺卡。贺卡不仅具有“见字如面”的亲切感，还给收件人永远的留念。

书法曾是日常书写的主要存在形式，有的师友才华横溢，笔力雄健，写卡片时，将鲜明的个性、超逸的品格诉诸笔端，无论是自作诗词，还是“向您拜年”“吉祥如意”“恭贺新禧”等简单祝福，都给人以冲和之美。我们观看卡片上的字迹，觉得那些文字，变得有血有肉，充满生机趣味，仿佛能跃出纸面，跳入心间。

“手札八行诗一篇，无由相见但依然。”辞旧迎新之际，一些师友不但斟酌字句，还将小小的拜年封片变幻出许多新意，比如在封片上贴了前一年和当年的生肖邮票，分别加盖当地除夕和正月初一的纪念邮戳或日戳。方寸天地虽小，艺术典范尽容其中，令人爱不释手。有的师友算准了寄达时间，邮件于正月初一准时投递到对方的信箱中。但有时会因各种原因致使祝福卡片晚到几天，当然，“有心拜年十五不晚”。

明信片上的图画，不同于照片，在设计发行之初即经历了严苛的取舍，只有高水准的漫画、版画、油画、水彩画、摄影作品等，才能进入备选平台。记得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新春，我给同学们邮寄新年明信片，其中有一

位同学在回函中写道：“今天总算见到新年明信片的庐山真面目了，以前我一直将‘明信片’写成‘名信片’，想想自己还是语文老师，差点误人子弟，你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啊！”实寄片的价值，还表现在卡片中各种邮戳所承载的邮路，准确见证了寄收时间，深深地烙上了岁月印记。

“八行代我传心事，千里从人索好音。”人们使用较多的是邮政发行的贺年有奖封片，发行20余年来，一直保持着系列性和延续性，该体系包括明信片、信卡、普通封、幸运封等，全都印有邮资图，寄往全国范围内不用再贴邮票，既方便又实用。犹忆12年前的乙酉鸡年，贺年有奖明信片全套31枚，背面图案为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年快乐图，表现不同的地域景观和人文风貌，形式新颖又洋溢着喜庆。我特地在前年购买了数十枚浙江版明信片寄给省外的师友。而那年我收到的贺年片中就有19张属于该套明信片，极富趣味性。这类封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封片上印有兑奖号码，收件人希望将好运传递给收件人。一般元宵节晚上开奖，三月至五月初兑奖。某年五一前夕，有位老师打电话给我，高兴地说：“谢谢你的红包！”我一时诧异，细问之下，才知我寄的明信片中得了二等奖。我也有幸得过几次小奖，虽是些小物件，但终究是托师友之福，喜悦之情不可言说，这也可以视作正月喜庆气氛的延续。

有人说，如果把宇宙的形成比为一分钟，那么太阳系的形成只有一秒钟，地球的形成只是一天，人类的诞生——只是新年钟声敲响前的几秒钟。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新兴的即时通信工具被越来越多的人运用，传统的祝福邮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新年祝福的形式日新月异，但世间的真情、亲人的问候永不改变！

三北盐场之兴衰

老照片

桑金伟

自2017年元旦起，中国盐价全面放开，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总是把盐价管住，据载，西汉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举行对话会，说服那些反对盐铁官营的人士。看来我的远祖是盐铁官营的坚定践行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家乡曾经辉煌的老盐场。

我这里说的三北，是指1954年以前的余姚、慈溪、镇海三个县的北部，它们合起来，差不多是现今慈溪市的版图。自古以来，三北地区有过多个盐场，有据可查的是：石堰场、鸣鹤场、龙头场、清泉场、余姚场、庵东盐场等。

石堰场。2003年新编的《慈溪百事》中说：“石堰场唐代创设，名余姚场，宋初改名石堰场。”《清一统志》说：“（石堰场）在余姚县东二十里，旧名买纳场，元至正中设盐课司，今并置盐大使。”该盐场故址在现慈溪市横河镇的石堰（原称石堰乡）。据《慈溪盐政志》大事记中载：“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石堰场建盐课司于流亭山。”

鸣鹤场。《慈溪盐政志》中载：“北宋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置鸣鹤场于慈溪县之鸣鹤乡。”而《慈溪百事》说：鸣鹤场始建于唐。该盐场故址是在现在的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古镇景区一带，不过鸣鹤场盐区很大，东至龙头场，西至石堰场。又有说：宋初石堰场分东、西两场，东场曾划归鸣鹤场。鸣鹤盐场至今最大的历史遗迹是盐仓山。

龙头场。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置龙头场盐课司于镇海县灵绪乡三都。故址在伏龙山西侧即慈溪的原龙头场乡龙头村。目前的慈溪市龙头镇龙头村是由原田央陈、龙头场、林家三个村合并而成。龙头场所辖地西至鸣鹤场，东至清泉场，区域不大。

清泉场宋代时已经设立。据《浙江省盐业志》载，宋崇宁三年（1104年）置清泉盐场，盐课司驻崇邱觉海院东（其地后称衙前），领管（镇海）全县七乡盐事。镇海的庄市在元代时称清泉乡，民国19年，清泉以乡驻地庄市村改名为庄市镇，2001年9月后改为庄市街道。衙前村现属北仑区小港街道。民国2年（1913年）划清泉场归鸣鹤场。我想，从地域上说清泉场不属三北的盐场，理由是它在原

镇海县的东南部。

余姚场就是石堰场并延及到后来的庵东盐场。余姚场之称梅开二度，石堰场唐代初创时就叫余姚场，后改。宣统三年（1911年）起复称余姚场。民国4年（1915年）废石堰场的六仓改划七区，此时，余姚场作业区已北移至庵东场区。民国5年（1916年）余姚场场公署由石堰迁至庵东镇。直至1954年10月姚北划入（新）慈溪县后，余姚场之称才告结束。

庵东盐场。庵东一度因盐成为特区，是当时独立于余姚县的县级盐区。新中国成立后，曾建立过许多以发展工、农业为目的的“矿区”“盐区”“林区”等特区，行政级别一般为县级，现已基本撤销。1950年3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成立庵东盐场特区，原庵东区政府改名为庵东盐区政府，余姚盐务局更名为浙江省盐务管理局第一分局。1953年5月撤销庵东特区建制。翌年5月又恢复，并直属宁波专署领导，可见当年庵东盐场地位之重要。1956年6月庵东盐区划归慈溪县管辖，那时庵东被称为“小上海”，庵东盐场被誉为“浙江盐都”。

在上面6个盐场中，除庵东是现代盐场外，其他可称为古盐场。此外，在现代盐场中，还存在过浒山盐场、逍林盐场等，它们场地

小、历史短，就不再赘述了。

从宋代开始的煎灶煮盐（煎熬），到清末兴起的一块块木质盐板上晒盐（板晒），再到1960年后在滩地中压成的晒场上晒盐（滩晒），后到晒场上铺设利于吸热的黑色塑料薄膜，在膜上晒盐，三北盐场经历了单位面积产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而一步步提高的过程。

产能提高了，盐场自然可以减少。古代，沿海遍地是盐场，到后来，沿海遍地是庄稼。伴随着上述大趋势，三北盐场还呈现特有的向北退的趋势，也就是说，海塘不断地向北部的后海修筑，滩涂也不断地向北淤涨，盐场就不断跟着咸地向北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盐场也逐渐减少。

据载，宋、元至明代成化六年（1470年）以前，三北各盐场位置在大古塘以北、湖塘以南。大古塘就是第一塘，筑于宋庆历七年（1047年）。后来的桥头、樟树、白沙、浒山、历山、周巷、朗霞、泗门、临山等乡镇都建在大古塘边。我自小就生活在大古塘南侧，那时附近有个小村叫盐仓基，几年前盐仓基的地名还保留着。

1470年湖塘筑成，盐场渐渐推移到湖塘以北。至明弘治二年（1489年）筑周塘，盐场又渐移到周塘以北。清顺治元年（1644

年）至宣统末年（1911），又新筑榆柳塘、利济塘、晏海塘、永清塘，清代盐场就在这四塘之间。其间，鸣鹤场已经衰退，宣统三年（1911年）龙头场废弃，残余归属清泉场。延至民国时期，盐场位置又北移到六塘以北。方兴未艾的庵东镇正处于六塘上，庵东盐场即将问世。1919年，鸣鹤场废场改农，所剩晒板并入余姚场。而此时的余姚场（庵东盐场）却成了浙江第一大盐场。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952年）是盐场裁废期，然而此时庵东盐场的名头开始叫响。

1967年至1979年，庵东盐场的年产量达到顶峰，在20万吨左右。大凡一个产业达到了顶峰，意味着离拐点不会太远了。1980年以后，盐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远低于农业和养殖业，更低于工业，盐民不愿晒盐，盐田转产面积增大。至1987年底，已有85%的盐田转农，年产量仅剩1万吨。

21世纪初，三北盐场中坚持到最后的庵东盐场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编的《慈溪盐政通史》大事记中记载：“2001年11月9日，慈溪盐业最后810亩盐田废转。有着千余年产盐历史、曾是江南最大的盐业基地的庵东盐场（前身为余姚盐场）结束产盐历史。”短短的文字里，带着深深的眷恋。



①塑料薄膜上晒盐。
②盐业最后的盐场。
③现已难得一见的老盐板。

(桑金伟 摄)



东钱湖畔，忻氏追源

乡愁

林 鸥

又一次来到东钱湖边，湖光山色，令人悦目。这次探访是为了给“宋代就有忻氏居住于此”找到更可靠的证据。

东钱湖边的忻氏，虽然崛起于明代中期，但500年后竟然已在陶公山下占半之地，可谓“大公一条街”，亍于三四里，一问路边人，家家都姓忻。据民国年间统计，这里的忻氏有3000户1万之多。现在忻氏子孙不但遍布海内外，在上海就有8000人。偶遇忻姓者，问起籍贯，大多是宁波陶公山人。

因为母亲姓忻，我也算是半个忻家人，我在10多年前开始寻访忻氏之根，碰到最多的便是东钱湖陶公山人。曾电话追踪到内蒙古，那里的一位忻氏族人自称是支援内地建设时过去的，祖籍宁波陶公山；又打电话问宁波陶公山忻氏始祖的原籍地福建南安，回答是当地无忻氏。再查询福建省有关忻氏信息，问到几个忻氏族人，先说是北方人，我心中一喜，以为有寻根的线索，再问才知福建的北方指浙江，这几个忻氏族人还是宁波陶公山人。

再说20多年前，台州天台有个青年来到东钱湖一带打工，他意外发现陶公山上有不少忻氏的坟，而他也姓忻，于是回村和本族乡亲一说，这才发现原来他们一族是宋时从东钱湖陶公山迁去的。于是村

里派人背着老家谱来寻亲，经过一番周折，见到了当时陶公村中对历史有研究的忻元良老先生。把两地家谱一一比对后，发现台州忻氏的祖先居陶公山时是宋代，现在陶公山忻氏的祖先来陶公山时是明代，两家家谱排行也不同，所以并不是同宗。

不过，天下忻氏是一家，所以当1995年台州忻氏重修宗谱时，陶公山忻氏派代表前往送匾庆贺，还带回一部新修的《天台忻氏宗谱》。台州忻氏为表示要与故乡的宗族联宗，在重修宗谱中还新列排行，以与陶公山忻氏排行一致。

但台州忻氏老家谱中传递出的信息，让一直坚持自己是福建南安来的陶公山忻氏族人有点迷惑了。据台州忻氏老家谱记载，忻氏是春秋时帮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范蠡之后，当地还传说陶公山之名是忻氏所取。若这两条属实的话，足以改写春秋范蠡的传记和宁波东钱湖史。陶公村一些忻氏族人在接待各地游客时，也会讲一些范蠡和陶公山的传说。

但民间故事要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方是信史。我遍查宋元时的宁波地方志，并无陶公山信息，更无忻氏线索，只有南宋名相史浩的诗集中提到陶公山。但台州忻氏老家谱中的说法也不能轻易否定，我另辟蹊径，试着从东钱湖有宋元老家谱的其他姓氏中寻找证据。

后代更是遍布湖边，绵延千年。至清光绪年间，以史家湾史氏宗祠为大宗，人口最多，家谱最厚，《鄞东史氏宗谱》有12本。

一年前，我到上海图书馆查各种史氏宗谱，当时《鄞东史氏宗谱》只有残存的6本，没有找到关于宋时忻氏的信息。一年后我找到《鄞东钱堰史氏宗谱》，才见到史浩的五世孙（即史浩之子史弥坚的曾孙）史冕娶忻氏为妻，并迁居陶公山。这成为现在史家湾史氏始祖的文献证明。再进上海图书馆，又在《四明史氏分支稿》中找到史冕孙“宋时自鄞徙陶公山”的记载。

这一次，我再到东钱湖边，正是为了寻访史家湾史氏宗祠，同时想见见史氏族人是否还保存有老家谱。这可是史氏太公和忻氏太婆在史家湾的第三个文献证明。

在史氏宗祠工作的史佩玉先生拿出其父史美发老人生前用朱笔抄录的小家谱，上面写明“史冕孙，配忻氏，封孺人”。这份小家谱，记录了史佩玉先生这一家20代人与忻家的种种姻缘，见此不由感慨万分。一年前，我写过《忻氏与史氏的姻缘》，当时对史氏所知不多。一年后，我又续写忻氏与史氏的姻缘，真是千年之缘，缘缘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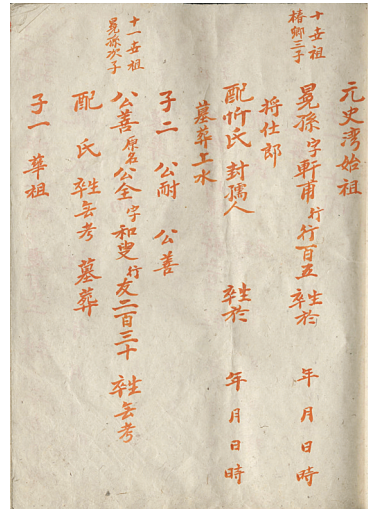
史氏宗祠中一位老人问我，怎会对史氏有兴趣？我答道，我既是忻家外甥，又是史家外孙，血脉相连。

因有家谱的传承，我求证了东钱湖两支忻氏家族的聚居时代，同时还发现这两支忻氏家族因与史氏联姻，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史浩

的后人。东钱湖边，湖水相连，各家族间也如这湖水一般，难解难分。我在读谱中发现，除忻氏和史氏有姻缘外，北宋名相包拯的18世孙包星也住东钱湖边，也娶忻氏为妻。另外一些姓氏老家谱中，也有与忻家联姻的记载。

发现陶公山在宋代即有忻氏居住，应该说填补了宁波古姓氏居住史的空白，同时也证明了台州忻氏家族在宋代居住于陶公山的传说不是虚言。

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在东钱湖聚居的这两支忻氏家族祖源在哪里，不过我相信凡走过必有痕迹，总有解谜之时。



史湾家谱抄本中的忻氏标注。

甬城绘



和丰纱厂旧址·小洋楼

小洋楼是和丰纱厂旧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二层外廊式西洋风格楼房，四坡顶，面阔三开间，前有围廊，柱头为爱奥尼柱与科林斯混合式，外墙红灰相间，内部装饰西化，房间、廊前顶上均饰石膏吊顶与石膏线脚。

原和丰纱厂创建于1905年，由戴瑞卿等21人组成“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和丰纱厂），是新中国成立前宁波工业代表中“三支半烟筒”之一。201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保单位。（丁安 绘）